



中青年经济学家文库

ZHONGQINGNIAN JINGJIXUEJIA WENKU

浙江省软科学研究项目成果 (2012C25082)

人情关系影响下的 产业集群演化机制

陈伟民/著

RENQING GUANXI YINGXIANG XIAXE
CHANYE JIQUN YANHUA JIZHI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中青年经济学家文库

浙江省软科学研究项目成果 (2012C25082)

人情关系影响下的 产业集群演化机制

陈伟民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情关系影响下的产业集群演化机制/陈伟民著.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5.8
ISBN 978-7-5141-5921-9

I. ①人… II. ①陈… III. ①产业经济学-研究
IV. ①F06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67016 号

责任编辑:程晓云
责任校对:王肖楠
版式设计:齐杰
责任印制:王世伟

人情关系影响下的产业集群演化机制

陈伟民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100142

总编部电话:010-88191217 发行部电话:010-88191522

网址:www.esp.com.cn

电子邮件:esp@esp.com.cn

天猫网店:经济科学出版社旗舰店

网址:http://jjkxcbs.tmall.com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880×1230 32 开 8.75 印张 230000 字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141-5921-9 定价:26.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88191502)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88191586)

电子邮箱:dbts@esp.com.cn)

前 言

人情关系是一种特殊的人际关系，其人情投资、人情回报的人际交往原则对产业集群的类型选择、产生集群形式与发展、集群企业创新动力、企业之间竞争协作等方面产生重要影响。

本书以探寻人情关系影响下产业集群的发展状况、集群企业的创新动力大小和合作创新水平高低为目标，提出一种运用复杂系统理论分析人情关系与产业集群演化机制关系的新方法。

一个区域选择什么样类型的产业集群，归根到底是选择什么样的合作对象，而选择什么样的合作对象取决于决策者将注意力资源配置在什么类型的合作伙伴上。通过运用知觉负载理论、情绪唤醒理论以及社会学相关理论进行分析，提出产业集群类型的选择与人情氛围有关，人情氛围下的决策者选择面狭窄，而非人情氛围下的决策者选择面宽泛。

在一定条件作用下，产业集群的演化过程是一个自组织过程。影响产业集群自组织演化的条件是：集群系统的开放性；集群内企业之间、企业与其他机构之间关系的非线性；集群演化处在远离平衡状态；集群系统具有使系统突破临界点的涨落存在。人情氛围下集群系统中的开放性状态、集群成员间的竞争与协作状态、系统的正反馈和集聚状况，不足以使得集群系统的演化具备自组织演化的条件。

产业集群的核心竞争力体现为集群所具有的差异性，而差异性与集群成员的创新动力密切相关。集群成员的创新动力与特定知识产权伦理有关，而特定知识产权伦理是由特定文化、习俗背景下形成的认知结构所决定。人情关系影响下关于人际关系的认知结构决

定了集群成员要将人情投资和人情回报作为人际交往规则，由此形成了充满人情味的知识产权伦理，需要创新者将创新成果在特定人情圈内共享。独自承担创新成本却不能独享创新收益，挫伤了创新者的创新积极性，影响产业集群的核心竞争力的提高。

制度与技术创新的关系是超循环的关系，制度具有对技术的催化支撑的作用。具体来说，制度是促进技术创新系统自组织演化的关键因素，决定技术创新系统自组织演化的结果；制度影响集群企业自生能力的形成，从而影响集群创新机制的形成；制度作为反映技术创新演化的混沌模型中的控制参数，决定技术创新系统演化是处在萌芽、成熟还是处在混沌阶段。作为非正式制度的人情规则对集群技术创新起到了制约作用：人情规则影响技术创新系统的自组织演化；人情规则影响集群企业自生能力的形成；人情规则制约了技术创新系统向成熟阶段的演化。

合作创新是指企业与其他企业或机构建立技术合作关系，在共同确定的研究开发目标的基础上实现各自目标的技术创新活动，合作创新系统中出现的合作创新成果是系统的涌现。人情关系影响下的合作创新系统，一方面由于缺乏能够产生使创新系统涌现的条件，另一方面反映合作创新系统演化的混沌模型中的控制参数偏小，制约了合作技术创新系统向成熟阶段的演化。

产业集群的演化过程、集群技术创新系统的演化过程和合作创新系统的演化过程，均表现出复杂性和非线性，具有“内在的随机性”特征，可以运用混沌模型来反映其演化过程。为此，分别建立反映这三个演化过程特点的混沌模型，研究人情关系对混沌模型中控制参数的影响，从而可以更客观反映人情关系对产业集群形成、发展过程中的影响。

人情关系与产业集群演化机制的关系，现有研究尚无涉及，本书的研究可以填补这方面的研究空白，并且研究结果对人情交往特征明显的地区如何根据人情关系的特点来营造一个良好发展的氛围，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目 录

第一章 对非正式制度与产业集群演化关系研究的思考	1
第一节 非正式制度对产业集群作用的理论研究综述	2
第二节 对现有研究的评述	16
第三节 进一步研究的思考	24
第二章 产业集群模式的选择机制	30
第一节 相关研究综述及评价	30
第二节 注意力配置	33
第三节 知觉负载与注意力配置范围	49
第四节 风险意识与合作伙伴选择中的注意力配置	61
第五节 产业集群模式的选择	69
第六节 本章小结	84
第三章 人情关系影响下产业集群的演化机制特征	85
第一节 产业集群的性质、属性	85
第二节 产业集群演化的自组织属性	100
第三节 人情关系影响下产业集群演化过程中的 自组织能力	110
第四节 产业集群演化过程的混沌模型	134
第五节 本章小结	142

第四章 人情关系影响下产业集群的核心竞争力	144
第一节 产业集群核心竞争力的体现	144
第二节 人情关系认知结构下的知识产权伦理	147
第三节 人情规则下的知识产权伦理	164
第四节 本章小结	174
第五章 人情关系影响下集群技术创新系统的演化机制	176
第一节 制度背景下的技术创新	176
第二节 人情规则下的技术创新机制	190
第三节 产业集群创新系统演化的复杂性分析	212
第四节 人情关系下技术创新水平的实证分析	218
第五节 本章小结	225
第六章 人情关系影响下合作创新系统的演化机制	227
第一节 对现有研究的综述和评述	228
第二节 产业集群合作创新的涌现过程	235
第三节 人情关系影响下合作创新系统的混沌分析	245
第四节 实证分析	254
第五节 本章小结	259
参考文献	260

第一章

对非正式制度与产业集群演化 关系研究的思考

非正式制度，又称非正式约束、非正式规则，是指人们在长期社会交往过程中逐步形成，并得到社会认可的约定成俗、共同恪守的行为准则，包括价值信念、风俗习惯、文化传统、道德伦理、意识形态等。这种规则，是一系列基于特定社会网络、信任关系、隐含知识和组织资本的行为规范，它们在实际生活中调节了大量的人类行为。

产业集群是指集中于一定区域内，从事特定产业的众多具有分工合作关系的、不同规模等级的企业，以及与其发展有关的各种机构、组织，通过纵横交错的网络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空间积聚体，代表着介于市场和等级制之间的一种新的空间经济组织形式。在产业集群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地理上相对集中并具有交互关联性的企业之间，企业与其他机构之间，形成了各种竞争与合作。为了使这种竞争与合作顺利进行，需要有各种行为规则来规范相关主体的行为，非正式制度就是其中的一种。为此，很多研究将非正式制度与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联系起来考察。无论是在巴格那斯科的“第三意大利”研究中，还是在欧洲创新小组（GREMI）的“创新环境”研究中，以及国内学者对非正式制度在集群发展演进中的作用的研究中，都强调或暗含着这样的基本观点：产业集群所在的地区所具有的不可模仿性和历史继承性的风俗、文化、社会关系等非正式制度，已成为促进集群企业合作并由此产生促进集群发

展的主要动力。

人际交往规则是人们在人际交往中必须遵循的一种行为规则,属于非正式制度的范畴,具体体现在人与人交往的人际关系之中。人情关系是一种将人情因素融入人际交往中的特殊的人际关系,遵循的是人情交换规则。本书研究人情关系下的产业集群的演化机制,可以归属于非正式制度与产业集群发展关系的研究范畴。

探索非正式制度在产业集群形成与发展中的作用的问题,已成为当前国内外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经济地理学等学科研究热点,涌现了很多研究成果。从已有的文献中可以看出,学者们都十分重视非正式制度对产业集群发展的促进作用方面的研究,同时也注意到了非正式制度对集群发展的局限性研究。这些研究不仅使丰富多彩的产业集群发展的实践得以梳理和总结,而且使非正式制度对产业集群发展的作用研究提升到了系统的理论分析和构建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的程度,丰富和发展了产业集群研究的理论,为研究产业集群的发展开拓了新的研究途径。但目前国内外学者关于非正式制度对集群发展中作用的研究存在不足或局限性。这些不足或局限性有些是因研究范围的问题所致,如对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非正式制度与产业集群发展的关系的研究涉及较少,使得诸如人情关系对产业集群发展的影响这样的研究仍属空白;另有一些不足是由于对制度的理解上的偏差所致。以下首先梳理国内外关于非正式制度与产业集群发展关系的研究成果,然后对现有研究存在的局限性进行评述。

第一节

非正式制度对产业集群作用的理论研究综述

非正式制度对产业集群作用分为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目前在非正式制度对产业集群作用的国内外研究中,积极作用的研究是主体。

一、非正式制度对产业集群发展的积极作用

（一）国外学者的研究综述

1. 新产业区学派

谈到新产业区学派，不能不谈到产业区学派的创始人——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马歇尔（Marshall）。马歇尔继承了亚当·斯密（Smith Adam）对劳动分工的开创性理论，第一个比较系统研究产业集群现象，提出了产业区理论。

新产业区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是各种企业在一定区域内的集聚，其兴奋点不在于产业集聚而导致的产业空间的扩大和生产规模的扩大，而在于其外部经济性。马歇尔发现了外部规模经济与产业集群之间的密切关系，他认为产业集聚的原因主要是外部规模经济所致，生产和销售同类产品的企业或存在产业关联的上中下游企业集中于特定的地方，便于使用专门人才、专门机构、原材料并因此产生很高的效率，而这种效率是处于分散状态下的企业所不能达到的。正是这种效率形成的外部规模经济，促进企业集中在一起，并形成了产业集聚。因此，马歇尔认为产业集聚本质就是把性质相同的中小厂商集合起来，对生产过程的各个阶段进行专业化分工，实现作为巨型企业特征的规模经济生产。^①

在影响产业集聚的各种因素中，马歇尔最早认识到了社会文化因素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他认为产业区内的经济主体一般具有相同的文化背景、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这促成了经济主体间的相互信任，对于形成高度合作的“产业空气”十分重要。马歇尔认为大量企业之所以会集中在某一地区而形成产业区，是与该地区地理、历史、政治、文化等特性有密切关系，正是这种特定的社会文

①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80、284页。

化因素造就相关企业在特定区域的集聚。

在马歇尔以后,很多学者对新产业区理论进行了研究。贝卡提尼(Becattini, 1990)对马歇尔产业区理论做了进一步的发展,他认为,马歇尔式产业区具有以下几方面性质^①:(1)同一区域的社会成员具有相对同一价值观拥有共享的信任,这种价值观和信任观在整个区域传播,并通过家庭、教堂、学校、政党或企业等组织而代代相传。(2)专业化促使了同一生产过程不同阶段的众多企业在一定的空间集中,这些相互关联的企业相互之间产生强烈相互作用,正是这种强烈的相互关联使得企业深深扎根于这样的区域之中。(3)存在着显著的外部经济,这些外部经济对产业区是内部的,它们来源于大量具有相似特征的小企业在特定区域的集中或产业的地方化。(4)存在着鲜明的产业空气,如大量熟练工人和专业人员的集中,有利于相互培训和干中学;高度的专业化、空间接近与文化的共同性,有助于创新和技术诀窍的快速扩散。

1977年,意大利社会学家巴尼亚斯科(A. Bagnasco)针对意大利传统的二元结构提出了挑战。他基于对意大利工业化进程的观察,独创性地提出了“第三意大利”^②。作为对传统二元结构模式的替代,“第三意大利”用于指在1960年和1970年经历快速工业化过程的意大利的中北部和东北部地区,这一地区的发展同不发达的南部地区以及传统的工业化的西北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而中北部和东北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最显著特征就是中小企业的地理集中以及部门专业化。与此同时,另有一些经济学家也发现,这一地区的发展突出表现为依附的、无效率的小企业主导的工业模式向小企业作为面向最终市场的、自主的、有效率的经济成分的转变。

在系统分析了意大利佛罗伦萨附近的图斯堪(Tuscan)的一些

① Becattini G.: The Marshallian Industrial District as a Socio - Economic Notion, in F. Pyke, G. Becattini and W. Sengenberger, eds., Industrial districts and Inter - Firm Co-operation in Italy, Geneva, 111S, 1990.

② Bagnasco, A., Tre Italie: La Problematica Territoriale Dello Sviluppo Italiano. Bologna: Il Mulino, 1977. 1 - 26.

产业区，尤其是对普拉托（Prato）的毛织品产业区进行了细致地分析之后，贝卡提尼（Becattini, 1990）首次提出了新产业区的概念，其定义为：“新产业区是具有共同社会背景的人们和企业在一定自然地域上形成的社会地域生产综合体。”^① 他指出了产业区的经济特点是劳动分工中的外部性，产业区内企业间的互动是因为有社会文化的支持。贝卡提尼（Becattini, 1990）还将“第三意大利”地区的经济成功归因于在本地劳动分工基础上所实现的外部经济，以及在当地共同文化、制度背景下企业之间的高效合作。在他看来，产业区就是具有共同社会背景的人们和企业共同文化、制度影响下所形成的地域生产综合体。

意大利学者的研究引起了美国社会学家皮奥里（Piore）与赛倍尔（Sable）的高度重视。他们于1984年合作出版的《第二次产业分水岭》，就是基于意大利以及西德等区域经济发展的经验材料，提出了资本主义由福特主义的大规模生产体制向后福特主义的弹性专业化生产体制转型的观点，极力推崇意大利基于专业化的、技术先进的中小企业空间集聚的工业发展模式，并将其作为弹性专业化生产的典范。从此，弹性专业化的工业发展模式开始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并有力促进了对“产业区”现象研究的复兴。他们认为“第三意大利”的产业区发展是中小企业在弹性专精基础上实现的集聚，区内企业专业化程度高，通过信任和非正式或正式制度形成密切的网络关系，以调整企业间的合作与竞争，协同作用强，可以与以大企业为核心的区域进行竞争。^②

上述关于意大利新产业区的见解引发了更多学者对企业集群中非正式制度因素的关注。首先，很多文献讨论了社会与文化的同一性对企业集群发展的重要意义。派克和圣根伯格（Pyke & Sengen-

① Becattini G. : The Marshallian Industrial District as a Socio - Economic Notion, in F. Pyke, G. Becattini and W. Sengenberger, eds., *Industrial districts and Inter - Firm Co-operation in Italy*, Geneva, ILS, 1990.

② Piore M. and Sable C. : *The Second Industrial Divide: Possibilities for Prosperit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4.

berger, 1992) 认为社会、制度因素对新产业区的成功非常重要, 密切的社区联系与文化、政治因素一起保持了当地的一致同意和共同的价值观, 有利于社会妥协和企业之间的合作。产业区内的企业与其他行为主体如零部件供应商、客户企业、地方政府组织、中介组织和研究机构形成了紧密的分工合作网络, 而本地共享的社会人文环境则保证了这个专业化分工体系的高效运行, 有力地促进了企业发展和地区增长。^①

综合上述观点, 新产业区是由社会分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企业所组成的本地化网络, 其主要研究企业与其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下的企业集群的空间结构。新产业区的柔性和弹性取决于企业间的竞争和协同态势, 其形成的基本条件主要有:

第一, 企业组织网络体系具有高度灵活性。由于在企业的创新和发展进程中面临日益不确定的环境, 区域内网络体系是企业发展与创新活动的重大战略行为。企业组织网络体系的高度灵活性源于企业的“柔性”, 其“柔性”主要体现在: 企业内部生产与管理方式的柔性化、建立和发展企业之间的新型协同关系以及采用新的柔性劳动过程。

第二, 根植于本地的社会文化。企业在特定的区域集聚源于其根植性, 即企业的运作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独立领域, 它深深地嵌入于社会文化及政治制度之中。在生产过程中相互关联的企业集聚的原因, 一方面是因为需要进行专业化协作而依附在某一个产业链上, 另一方面是企业拥有共同的社会文化背景而集聚同一区域。在这样的集聚下, 企业既保持了与集聚区内企业间的基于专业化协作网络状联系的密切性, 又在集聚区内形成了自身特有的网络文化。这种文化、制度一体性的组织架构是新产业区持续优势的坚实保证。新的知识和信息流动的主渠道依赖于本地拥有的共同的文化背

^① Pyke and Sengenberger W (eds): Industrial District and Local Economic Regeneration, Geneva: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Labour Studies, 1992.

景,集聚区内的企业家在经常的联系、互动过程中所采取的各种经济行为深深根植于同一文化氛围、环境和交易规则,因而具有归属感、依赖性和可预见性。共同的人文环境产生的信任、理解与相互合作,既能有效地防止各种机会主义行为,又能促进知识的流动和扩散,尤其是区域外竞争者难以复制的隐含经验类知识。相互信任和满意成为区域内最有价值的资源要素,促使相关企业黏合在一起,既营造了区域创新环境,又培育了本地化的创新网络。

2. 新产业空间学派

20世纪80年代以来,很多学者将企业集群看成一种有效的创新环境或系统,有关不平衡空间经济发展的理论和二次产业划分理论对空间经济学产生了有力影响,产生了“新产业空间经济学”学派。该学派认为,不确定的市场条件和技术路径已经取代了过去那些外生的和内生的确定性市场条件,因此,为了减少技术锁定、劳动力囤积以及生产能力过大的风险,生产需要外部化(垂直分离)(Christopherson & Storper, 1986)^①。同时该学派认识到存在于特定区域中的制度的重要性,认为在企业集群中,市场本身纵然存在很多形式的合同,但并不能成功地协调交易关系,本地化的生产协作网络具有降低社会交易成本和保护合作的功效,因此有利于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和灵活适应性(Storper, 1989)^②。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受皮奥里与塞倍尔《第二次产业分工》著作的影响,该学派吸收了马歇尔产业区理论和弹性专业化学派有关劳动分工的弹性专业化思想以及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理论,以新古典经济学的视角,全面关注于劳动分工、交易费用和地理集聚之间的相互联系,特别强调在新的劳动分工背景下新的产业

^① Christopherson S. and Storper M.: The City as Studio, The World as Back Lot; The Impact of Vertical Disintegration on The Location of The Motion Picture Industry,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4: 305-320, 1986.

^② Storper M.: The Transition To Flexible Specialization in Industry: External Economies, The Division of Labour and The Crossing of Industrial Divides,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13: 273-305, 1989.

空间形成的“交易费用”机制。该学派认为,不确定的市场条件和技术路径促使企业发生外部化的垂直分离,这一方面可以减少生产能力过大(包括生产和劳动力囤积)的风险,另一方面也可以获取专业化的好处并降低技术锁定的危险,但这也由此大大增加了企业间投入产出联系的交易费用。由于企业外部交易的频繁性、不可预测性和复杂性,交易费用对地理距离就变得非常敏感,而本地化投入产出联系和生产协作网络所形成的弹性、降低风险和专业化等相互依赖的外部经济优势,能够有效降低交易费用并保护合作,因而能够促使企业集聚。这样,在强烈不平等竞争和新技术、新产业快速兴起的工业化过程中,一些新的产业空间(如硅谷)便应运而生,同时那些传统产业区(如好莱坞)也通过组织和技术变化从大规模生产和空间扩散走向垂直分化和再集聚。

斯科特(Scott, 1992)沿袭了“柔性专业化”导致劳动社会分工加强的观点,并运用交易费用理论,解释产业集群的形成机理,认为在劳动社会分工日益加深的前提下,企业间的交易频率增加,并进而导致交易总费用上升。由于交易费用与地理距离呈正相关,企业通常在本地寻找交易对象,从而促成地方企业群的形成。斯科特还认为,在任何情况下,现代产业系统中的竞争都不可能是纯粹市场化的,而是要受到非正式制度框架的影响。这些制度框架把买卖双方企业按照他们熟悉和互惠的交易惯例联系起来,这反过来又促进多种合作形式,因此加强了特定产业区的比较经济优势。^①

新产业空间学派强调的本地化的生产协作网络以及短地理距离之间的交易,与新产业区学派所强调的根植于同一文化氛围、环境和交易规则,属异曲同工。

^① Scott, A., The Collective Order of Flexible Production Agglomeration: Lessons for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Policy and Strategic Choice. *Economic Geography*, 1992, 68: 219 - 233.

3. 创新环境学派

该学派认为,环境是一种发展的基础或背景,它使得创新性的机构能够创新并能和其他创新机构相互协调。1985年,欧洲创新小组(GREMI)通过对包括“第三意大利”等在内的欧洲15个企业集群区域和美国硅谷的调查研究,提出地区社会人文环境有利于区内企业进行合作、信息交流和技术创新,是大量企业在该地域集聚的重要原因。他们认为,企业的发展依赖于其所在区域内结成的网络,这种网络不仅包括同一产业或相关产业上的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经济网络,而且包括企业在创新和发展过程中,与当地的大学和研究机构等科教组织、行会等中介服务组织以及地方政府等公共组织机构之间的合作而结成的研究和开发合作网、企业家间、社会关系网等。区域内社会文化环境的改善,有利于该区域创新网络的发育和创新功能的提高(Bramanti & Maggioni, 1997)。^①

罗森费尔德(Rosenfeld, 1997)认为,在一个有效的中小企业集群中,信息的流动十分重要,因为广泛的社会联系和信任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信息的流动和知识的传播,所以不可忽视作为信息交流平台的社会关系网络的作用,而这种社会关系网络的建立与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密切相关。^②

与美国经济社会学家格兰维特(Granovetter)的根植性(Embeddedness)思想相似,上述这些学者强调创新网络必须根植于特定的创新环境之中。另一些学者则将网络本身看作是创新环境。他们认为,地域由经济和社会相互作用产生的关系空间构成,时间则体现为学习和创新过程的步伐,地域由于在减少创新企业动态不确定性方面的独特作用而成为经济活动的控制者。因此,创新环境由一组关系(市场关系、权力关系、合作关系等)或网络构成,通过这组关系或

① Bramanti A. and Maggioni M. A.: the Dynamics of Milieux: The Network Analysis Approach, In Remigio R. Alberto B. and Richard. G. (ed), The Dynamics of Innovative Region: The GREMI Approach, Brookfield: Ashgate, 1997.

② Rosenfeld, S., 1997, Bringing Business Clusters into the Mainstream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 5, pp. 3-23.

网络,地方生产系统、各种参与者和它们的代表以及产业文化得以统一起来,从而产生了地方化的动态的集体学习过程。特别是合作关系或称地域网络,包括地方网络和跨区网络,构成了创新环境的核心组成部分,它们以一个集体的社会化的方式,通过“近邻效应”(Proximity Effect)和社会化效应(Socialization Effect),降低了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减少了创新的静态和动态不确定性,并为学习过程提供了持久的基础与保证。

(二) 国内学者相关研究的综述

在“关系本位”的华人社会中(梁漱溟,2011),经济系统与社会系统的交融一直是中国社会生活的基本范式,蕴涵于亲缘、地缘等关系网络中的非正式规范更是促进企业集群发展的重要因素,在企业集群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①。关于人际关系对企业集群的形成、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国内的很多学者给予了高度关注。

李胜兰(2008)认为^②,具有相同或相近的社会文化背景和制度环境而形成的地缘关系,使得集群内企业经济行为深深根植于共同地域的圈内语言、背景知识和交易规则,因而具有可靠性、可预见性,容易产生聚合效应和深度建立制度机制。因为当集群发展到一定的程度、达到一定的范围,单一群体内的信任已无法满足集群分工与交易进一步扩张的需要,信任的范围面临着进一步扩张。作为一种理性的观念,信任的类型既源于本地特殊的文化传统,又是现实生活中人们维系合作关系以满足自身多种需要的价值取向或经济伦理。因此,信任本身具有扩展的潜能,是一个不断趋于扩大的动态过程。当亲属范围内的信任难以满足人们的物质利益和精神需要时,人们就会通过选择一种新的社会关系来扩展信任,从而实现

①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② 李胜兰:《社会资本与产业集群企业合作效率研究》,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